

找个合适的位置

话说有个北大研究生去漆油漆,因为漆得不好,被现场的很多人嘲笑。看到这里我内心一酸,想起自己的一个事。

过年回家时正逢一亲戚家杀年猪,退完了毛,开膛破肚后自然切肉上锅。我怕自己闲着别人说,就拿着刀跟几个厨师在厨房切肉,可是我发现不管自己怎么努力,就是没有他们几个切得好,也没有他们切得快。他们自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,然后就开始嘲笑我:“你一个堂堂大学生,还切不赢我们,不行!”面对他们的话语,我无力反驳,因为事实上我确实切不过他们。

虽然很尴尬,并不可耻,我是个大大学生,可我不是个专门切肉的大学生。我突然想起了韩愈的《马

说》:“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。”这里的千里马是能力,而伯乐就是位置。纵使你有很好的才能,但如果不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之上,你也只能“辱于奴隶人之手,骈死于槽枥之间”。

鲁迅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,如果他不弃医从文,我想他至多不过是一个好医师或者好药师。而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好位置,才成了一个用笔杆子同敌人斗争而唤醒众多麻木中国人的人。

“漂母饭信”的故事众人皆知,可是谁能想到一个曾经吃不饱穿不暖,饿了只能靠乞讨的流浪汉能成为韩王呢。可喜的是韩信后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不仅拥有自己的封地,还帮刘邦平定了天下。

我们都知道创造了许多战事“奇迹”的诸葛亮曾是“躬耕于陇亩”的一介布衣,而尊称大公望的姜子牙只是渭水之滨的垂钓者。因遇到了刘备与周文王,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不仅成就了一番事业,也让自己名垂千古。

好位置,好,合适,擅长。然而现在职场上,人们都喜欢身兼数职,好像没有几顶帽子就不正常一样。我们都知道若让兔子去游泳队任职,让乌龟去长跑队工作会逗人笑话,可事实是很多企事业单位仍喜欢这样的用人机制。

当然作为个人,我们更应该明白自己适合什么,擅长哪些。只有给自己找个好的位置,才能物尽其用,发挥优势和特长,让自己更好地发热发光。

我们的康定情歌

郭昌平

| 记 | 忆 | 康 | 藏 | —

就连已经90多岁的老作家马识途先生也曾作出过“芳吉老诗人,令名少小闻。白屋遗卷在,天下浥清芬。”的评价。著名的文学评论家、作家、北大教授王利器先生则赞扬他是“声名扬益巴渝外,诗卷长留天地间”,这些都足以说明了吴芳吉先生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我见到的《婉容词》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正式出版的由吴芳吉先生著作的《白屋诗选》一书中所选。根据该书所载,该诗计划于1918年3月,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构思脱稿于1919年8月,其实写作只用了一个晚上。这是一首叙事体的诗歌。讲述的是一位名叫婉容的女子,其夫在1912年时单身赴欧洲留学,1915年到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,与美国女子自由相恋结婚,婚后由美国写回一纸休书,要将婉容休掉,婉容收到此书,悲痛欲绝,想到自己在家的艰辛,看到眼下的无奈,于是投江自尽。

全诗共91行,分为17个小节。“世间女子任我爱,世间男子随你求”一句出现于该诗的第四小节,总共三行,是婉容复述这封休书中的一段,“他说:‘我非负你你无愁,/最好人生贵自由/’世间女子任我爱,世间男子随你求。”以上是关于吴芳吉先生和《婉容词》的情况。

关于《康定情歌》,我曾在拙文《康定情歌的源与流》中作过较细的介绍,为了便于说明,这里不仿再作一点赘述。首先要弄明白的是《康定情歌》产生的大致时间。对于这个问题,现在是各说不一,有说100多年前的,有说200多年前的。其实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难,我们看一下歌词就明白了。歌曲一开始即唱道:“跑马溜溜的山上,一朵溜溜的云,端端溜溜的照在,康定溜溜的城”。显然此歌创作于有了“跑马山”的山名,有了“康定县”的县名之后。

那么,跑马山的山名起于何时?康定县的县名起于何时呢?

据康定回族老作家张央老师撰写的《康定跑马山》一文所记:跑马山,藏名“拉姆则”,意为仙女山。站在城内观山,山似无脊,谥称南无脊山。这山顶有高山湖泊五色海,所以又名叫五色海子山。跑马山腰台地,藏名“登托”,意为垫子。北宋时在这山腰台地修建了拉姆则(仙女寺),香火兴旺,盛时有喇嘛700余人,后焚于战火。清代,明正土司每年于农历五月十三日在“登托”山坪祭祀山神,并举行赛马会……从清代至民国赛马会年年年在“登托”山坪举行,久之,康定人就叫这地方为“跑马山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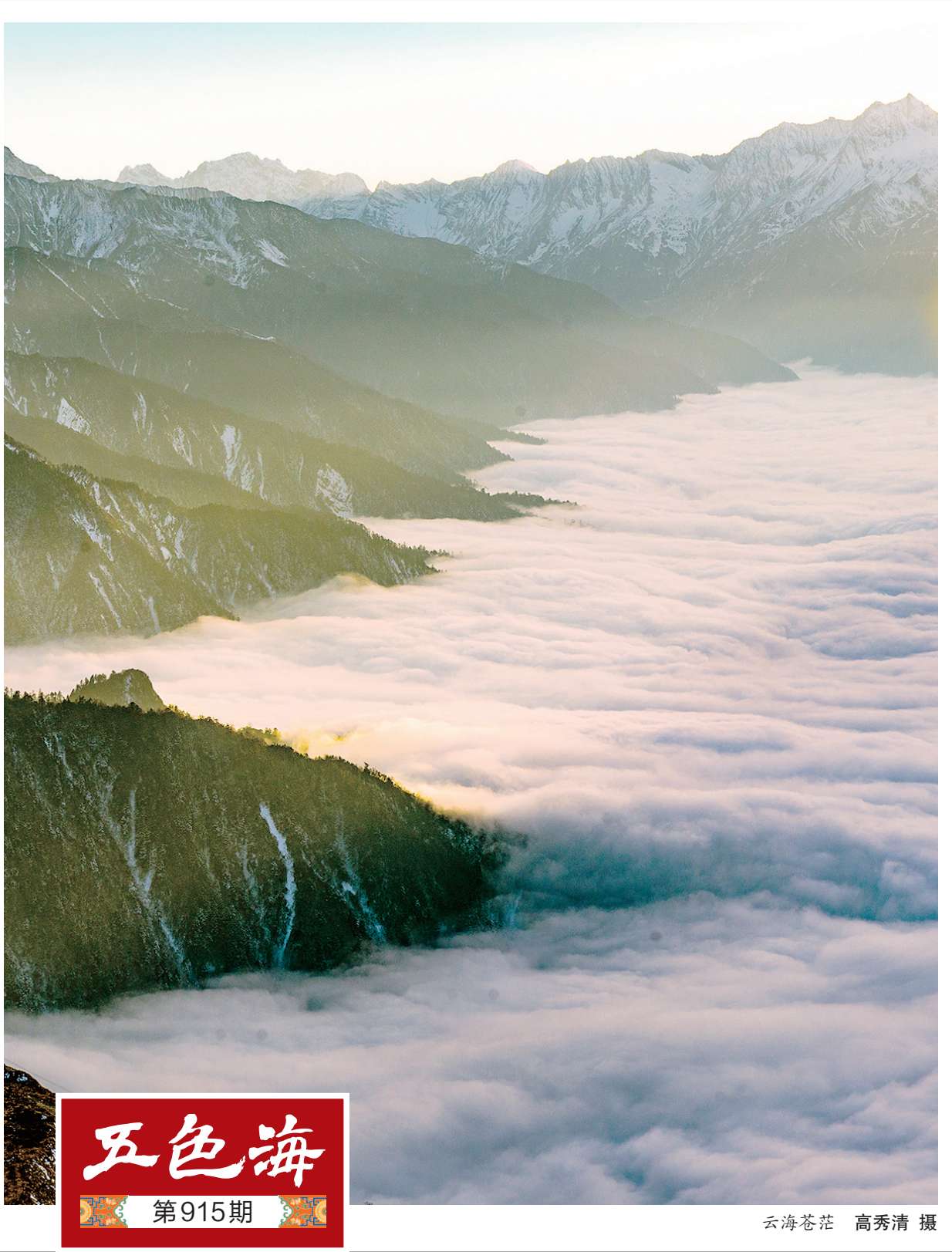
既然跑马山名缘于明正土司一年一度的赛马,那么明正土司又是什么时候进的康定城呢?据《康定县志》土司卷第二章第四节载:乾隆十年(1745年)坚参德昌24岁,“年岁合例”,承袭明正土司职,进驻打箭炉。可见明正土司正式搬进康定城是1745年的事,在拉姆则赛马就应是1745年以后的事了,而称“拉姆则”为“跑马山”最早也应是1750年左右。此时“康定”之名还没有,还称“打箭炉”,所以此时肯定也不会有《康定情歌》这首歌。

最早见“康定”之名是1908年,据《康定县志》概述载:光绪三十四年(1908)改打箭炉厅为康定府,“康定”之名始见于史册。宣统三年(1911年)赵尔丰改土归流。民国二年以明正土司中心部份和鱼通长官司全境设康定县,县境疆域初定。可见真正称打箭炉为康定县当是1912年以后的事了,由此说明《康定情歌》的诞生时间最早也应是1912年以后。

既然如此,我们先从时间上进行一个比较,就以《康定情歌》诞生于1912年计算,此时吴芳吉先生还没有写出《婉容词》来,如果说此时已有了《康定情歌》,那就可以断定歌中一定没有第四段,而只有前三段,第四段就一定是一919年吴芳吉先生写出《婉容词》以后,文人受其影响添加上去的。如果说此时连《康定情歌》也没有,那更说明,《康定情歌》的诞生时间一定是在1919年吴芳吉先生创作出《婉容词》以后。

再拿《康定情歌》第四段歌词与《婉容词》第四小节对比,《康定情歌》第四段歌词是:“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哟,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,月亮弯弯哟,任我溜溜的爱哟。”《婉容词》第四小节的原句是:“世间女子任我爱,世间男子随你求。”,歌词与诗歌相比就是多了作为衬词的“溜溜”几个字,并将“随”字改为了“任”字,除此可以说是一模一样,这难道是巧合吗?绝不是。

这只能说明,《康定情歌》第四段歌词就是源自于《婉容词》的第四小节中的两句诗,其思想的境界和文字的简洁绝不是当时康定本地人所能自编的。



五色海 第915期

云海苍茫 高秀清 摄

| 文 | 化 | 马 | 帮 | —

向古人借取防疫智慧

李艳霞

古人通常把疫情的发生,归结为不顺应天道,而造成了天对人类和众生的惩罚。其防控措施由设醮、纸船送瘟神等民俗,演变到对公共卫生防治的重视。

史料记载,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,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阔岁久,淤泥恶水,停蓄弗流,春秋之交,蒸为疠疫,乃作《开沟告诸庙祝文》,兴工清理沟渠。另载,吴芾于乾道二年(1166年)知隆兴府,当地“旧有豫章沟,比久湮塞,民病途潦。公曰:‘沟洫不通,气郁不泄,疫病所由生也。’亟命疏浚,民得爽垲以居。”

诸多典籍表明,防控疫情的最好办法,就是隔离。对染疫者的隔离控制观察,从秦代就已开始,以后历代都有所改进和发展。

《汉书·平帝纪》记载:“元始二年,旱蝗,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。”而到了南北朝时期,则已成为制度。萧齐时,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——六疾馆,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。而西晋(约公元3世纪)以前的官廷里已明文规定:如果朝廷官员家中有三人同样染上疫病,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官员无病,但一百日不准入官。可是,这种隔离方法推行起来并非一帆风顺,却被当时有人讥讽为“不仁”,不响应,致使疫情不断蔓延。但决大多数采取隔离的人,却安然无恙了。到了隋代(公元5~6世纪)已设置了“病人坊”。在这个基础上,以后历代对传染病隔离制度不断作了修正补充。如清朝曾设“查痘章京”一官职,他的职责是到各地去检查有否天花病人,一经发现,即强行将病人迁往很远的地方居住。以后又制定了海港检疫制度。渐渐地,传染病的隔离场所越来越完备。

当然,聪明的古人,在隔离的过程中,并非消极对抗疫情,而是采取熏蒸办法。

由于古代人没有口罩,就靠熏蒸和香囊保护自己的眼耳鼻口及皮肤,以免受到病菌感染。其方法很简单,它在家里,采取中药熏蒸,人人佩戴中药香囊,以传统防疫的古方和茶饮,达到解热消毒的效果。

苏轼曾在《与王敏仲书》中提到治疗瘧疫方是:“用姜、葱、豉三物,浓煮热呷,无不效者。”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的一则事例,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,颇有神奇之效。《清康熙间》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,元人笔记《辍耕录》中记载:元朝初年时,元军发生疾疫,以大黄疗治,所活近万人,效果亦极显著……

古往今来,疫情的传播和蔓延,与大量的人口流动有关。《宋史·五行志》记载,南宋隆兴二年(1164年)冬,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,结草舍遍山谷,暴露冻馁,疫死者半,仅有还者亦死。同时,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,是岁,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。正是人口的大量流动,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。

对此,古人提倡,顺应节气。先秦典籍《礼记·月令》讲:孟春行秋令,则其民大疫;季春行夏令,则民多疾疫;仲夏行秋令,民殃于疫;孟秋行夏令,民多症疾。

曹植在《说疫气》一文讲,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,病气流行,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。原因在于“阴阳失位,寒暑错时,是故生疫”。因而,先民们在有所兴作时非常重视顺应节气,一旦违背自然的法则,就会遭报应。

智慧的祖先,针对频发的疫情,彻底摆脱了封建意识,逐渐认识到疫疫发生与公共卫生有关,从而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事业,并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。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时期,《周礼·地官》中有司救一职,其职责就是:“凡岁时有天惠民病,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,而以王命施惠。”此举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。《后汉书·光武纪》载:光武帝时,天下疾疫,朝廷乃“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疫。”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载:“建宁四年三月大疫,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。”到了宋代,对疾疫的治疗上升为朝廷大计。每当疾疫流行,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,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。此外,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,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,极力救治,广为施医散药。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,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置了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,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,疾疫流行时,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。

这种施医散药,“发政施仁四海扬,太平世尊荣坐享”的济世情怀,历久弥新,正在播撒智慧……

从古人的防疫举措中,更能汲取智慧:那就是要顺应天道,如果不珍惜宇宙生灵的时候,祸害就会悄然降临。特别是,当祖先极力倡导的“道法自然”扛不住人类的贪饕和口腹之欲,忘记自然法则时,那个承载恶魔的“潘多拉盒子”,就会自动打开,恶魔会跳出来,疯狂追杀众生……

但是,汲取智慧的人们,会引以为戒,痛定思痛,逃离疫病和灾难!



康巴周末

康藏人文

2020年2月28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唐闻 组版:曹雪原

| 藏 | 戏 | 论 | 坛 | —

藏戏文化的演进历程

谢真元

藏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独具风格的民族戏剧之一,是一种以广场演出为主的面具戏,也是一门融唱、念、做、打于一体的综合艺术。它历史悠久,古老而又神奇。它以独特的形式及艺术风格,独树一帜于中华民族灿若群星的戏剧艺术之苑。藏戏的剧本、舞蹈、唱腔、服饰和面具等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,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性和广泛性上有独到之处。因此,它诞生600余年来,一直深受藏族人民喜爱,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完全可以自豪地说,“藏戏”与史诗《格萨尔王传》,是藏族人民为世界文化贡献的两大奇宝。

藏戏的风貌至今仍古朴、原始,它异彩纷呈而又神秘莫测,对于第一次听、闻并走近它的人来说,无疑是一种震惊体验:不仅是因为它极富传奇色彩的诞生,曲折迷人的故事情节,光怪陆离的面具,还因为它大量运用的原始宗教祭仪,以及独特的演出环境。笔者曾多次在雪域高原观看藏戏演出,它所带来的感染和震撼力至今仍刻骨铭心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当藏戏独具一格的鼓乐声响起并渐入高潮时,在那辽远、空阔的演出现场如同掀起了飓风,数百甚至数千人都 would 情不自禁被卷入其中。

在600多年发展、完善过程中,藏戏形成了《文成公主》、《诺桑王子》、《卓娃桑姆》、《朗萨雯蚌》、《白玛文巴》、《顿月顿珠》、《智美更登》和《苏吉尼玛》八大传统剧目。这八大藏戏,在西藏、青海、甘肃、四川、云南等省的藏族聚居地一直盛演不衰。同时,印度、不丹、锡金等国的藏民聚居地也流传着藏戏。由于各地藏区历史、文化、风俗等的差异,藏戏的发展很不平衡。一些研究者将其分为六个剧种,即白面具戏、蓝面具戏、昌都戏、德格戏、安多戏、木雅戏和嘉戎戏。其中,白面具藏戏最为古老,蓝面具藏戏发展最为成熟,而其余则是分属地方剧种。

关于藏戏文化起源问题的探究,至今尚无定论。学术界大体有三种观点:其一,认为它源于跳神,或称哑剧性的神舞“羌姆”;其二,认为它由民间说唱和歌舞发展而来;其三,认为它是多元起源,即藏区民间的歌舞、诗史、说唱艺术,以及早期的“羌姆”,均是孕育它的源头之一,都从不同方面对藏戏的形成产生过影响。印度戏剧和汉族戏曲也在不同程度上对藏戏的形成产生过影响。

我们倾向于第三种意见。但是截至目前,对藏戏起源形成的研究仍然很不充分,由于史料的匮乏,以至至今尚未有藏戏发展史面世。我们只能凭借收集到的史料记载和藏族民间的传说,依据现今的藏戏演出艺术和藏戏文学剧本,参照其他学者的研究,再以前面所述的戏剧理论以及汉民族戏曲的形成过程,进行对照分析,力求能较为客观地描述出藏戏的发展脉络。

如果把藏戏的发展史进行分期研究的话,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:

孕育期(远古到公元850年)

此时期相当于汉族社会从先秦至唐宣宗大中4年这一历史阶段,藏民族的原始民间歌舞、口头文学与宗教祭仪皆对藏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特别是1千多年前藏王赤松德赞时期,印度高僧莲花生大师到西藏传教,他采用藏族民间舞蹈与佛教的内容相结合的形式,便是在桑耶寺[关于桑耶寺建成的年代,有不同的说法。法尊法师认为是公元762年始建,766年建成;意大利学者伯载克(C.petech)认为是公元780年始建,公元787年建成;王森认为是公元779年建成。总之,大体年代是在8世纪的后半期。参见《西藏佛教史略》,王辅仁著,青海人民出版社,2005年版,第26页。]举行开光典礼时首次所跳的“羌姆”,我们认为,这是藏戏最初萌芽的标志。

有藏戏研究者认为,“羌姆”是用舞蹈形式表现鬼神故事,应视为藏戏形成的标志。我们认为“羌姆”只是一种宗教舞蹈,它虽然具有“装扮”即化身表演这一戏剧美的质素,但仅有装扮而无一定长度的故事情节的“跳羌姆”并不能视为戏剧,加之“跳羌姆”被称为是“哑剧”,即是说它既无唱词也无对白,其目的是为了镇魔酬神,与戏剧的审美功能迥然不同,因此,它决非是戏剧,仅仅只是藏戏的胚胎形态,是藏戏处于孕育时期的重要标志。与汉族戏曲一样,藏戏文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期,下面,我们从历史沿革、艺术渊源两方面来考察藏戏的孕育过程。(未完待续)